

政府采购与企业绿色并购

文 雯 王 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特别是加快企业绿色转型进程,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5—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绿色并购视角系统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引导作用。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行为,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在异地采购和绿色采购情境下,该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较长的供需互动周期和稳定的供需关系强化了政府采购的绿色治理效应。机制检验表明,政府采购一方面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治理、加强外部监督发挥“治理效应”,从而增强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动机;另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发挥“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推进绿色并购的能力。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企业属于污染型行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较高以及所在地区的政府环境治理强度较大时,政府采购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进一步表明,政府采购政策驱动下的绿色并购能有效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绿色创新水平和市场价值。本文丰富了绿色并购驱动因素以及政府采购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引导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借鉴。

关键词: 政府采购;绿色并购;治理效应;资源效应;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30(2026)02-0018-14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然而,以外延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资源消耗过高和环境压力持续加剧等问题,这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进一步地,2024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主体,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消耗资源和影响环境的关键责任主体,其绿色转型对实现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绿色转型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相较于依赖内部研发获取绿色技术,绿色并购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能够在降低自主创新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同时,通过技术协同与资源整合提升企业绿色转型的效率与战略执行力。因此,识别企业绿色并购的动

收稿日期: 2025-07-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数据开放赋能企业韧性提升的影响机制与政策优化研究”(25CGL056)

作者简介: 文 雯(1991—),女,安徽芜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王 赛(1995—),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生,本文通讯作者。

因,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环境政策在引导企业绿色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相较于以融资支持和要素保障为主的供给侧政策,需求侧环境政策通过市场化激励机制,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更具持续性和约束力的外部引导。其中,政府采购作为典型的需求侧政策工具,其制度功能不断强化。在采购过程中,政府兼具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通过制定采购标准与合同条件,对资源配置及企业生产与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合同约束直接引导企业绿色生产行为。例如,2017年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向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37)购买空气自动站运维服务,随后该公司于2018年开展绿色并购以加快环境治理相关业务布局^①。宏观上,2024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已超过3.37万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1.8%,其中,节能节水产品采购规模达337.23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92.48%;环保产品采购规模达795.4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7.98%^②。这些数据表明,政府采购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财政支出职能,而是逐步演进成一种兼具激励与约束功能的需求侧环境政策工具。那么,政府采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并购以实现绿色转型?若能,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又会带来何种经济后果?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企业绿色并购视角,拓展了政府采购经济后果的研究,系统揭示了政府采购影响企业绿色行为的内在机理。近年来,政府采购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从信贷约束^[1]、创新激励^[2]以及信息披露^[3]等角度验证了政府采购的治理职能,但尚未系统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对不同采购类型以及供需关系动态特征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也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发现政府采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揭示了政府采购影响企业绿色并购的内在逻辑,从企业绿色并购视角深化了对政府采购作用机制的理解。第二,从需求侧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的视角,拓展了企业绿色并购驱动因素的研究边界,揭示了政府作为市场参与主体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绿色信贷^[4]、“绿色化”金融考核机制^[5]以及环保税^[6]等供给侧工具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对需求侧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探讨仍相对有限。本文以政府采购为研究对象,从市场需求引导的视角识别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路径,不仅丰富了企业绿色并购的驱动因素研究,也为理解政府采购这类需求侧政策工具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系统阐述了政府采购激励企业绿色并购的作用机制、影响情境及经济后果,为“双碳”目标下强化财政政策的绿色引导功能提供了实践依据,也为优化政企协同的绿色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政府采购经济后果的研究;另一类是环境规制政策驱动企业绿色并购的相关研究。

1. 政府采购经济后果的研究。近年来,政府采购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引导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首先,已有文献验证了政府采购的治理效果。学者们指出政府采购发挥了有效的监督职能,通过在采购合同中嵌入制度性合规要求,显著提升了企业信息透明度^[7],抑制了税收规避行为^[8],降低了信贷风险^[1]。其次,已有研究支持了政府采购的资源效应。政府采购订单可以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增强企业经营稳定性,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劳动雇佣水平^[9]、创新积极性^[2]以及经营绩效^[10]。最后,学者们指出随着绿色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政府采购的绿色治理功能日益显现,在引导企业加快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政府客户通过需求侧激励机制,凭借其市场议价优势以及对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偏好,有效引导企业提高了气候信息披露透明度、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强度以及加速绿色产品开发进程^[3],提升了环境责任履行水平^[11],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12][13]},进而推动了企业的绿色转型进程。

2. 环境规制政策驱动企业绿色并购的相关研究。根据政策工具的不同实施方式,我国现行环境

规制政策主要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以及社会型三类。其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设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规范或禁止性规定,具有强制性与约束性。例如,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以制度约束强化企业的环境责任行为,从而引导企业通过绿色并购满足环保合规的要求^[14]。其二,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市场化手段或经济激励机制,引导企业或个人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供给侧市场型制度工具的绿色治理作用。既有研究发现,“绿色化”金融考核机制有效推动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及其市场表现^[5];增值税留抵退税和环保税通过激励污染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发挥了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6][15]};绿色信贷指引政策通过引导金融机构向绿色环保企业倾斜信贷资源,加强了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也显著促进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行为^[11]。其三,社会型政策工具则通过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等方式,对企业施加社会压力或道德约束,引导企业改善环境行为。既有研究指出,媒体压力会倒逼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并购^[16]。

综合上述分析,一方面,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政府采购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尤其是绿色创新,但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仍缺乏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尽管已有研究系统考察了供给侧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作用,但对需求侧激励工具的研究仍相对不足。本文以政府采购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其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揭示不同采购类型以及动态供需关系下的政策效果差异,为需求侧市场化环境政策的微观治理效应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二)理论分析

政府采购通过制度化安排影响企业战略决策,既可能通过契约约束和持续监督发挥治理功能,从而约束管理层行为^[7],也可能通过改善资源获取条件增强企业实施长期战略的能力^[2]。相较于以内生研发为主、调整周期较长且结果不确定的绿色创新路径,绿色并购作为企业重要的外源式绿色转型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帮助企业获取成熟的绿色技术、生产能力与环境资质,并通过技术协同与资源整合实现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同步提升^{[17][18]}。作为典型的需求侧政策工具,政府采购通过采购标准设定、合同约束及长期供需关系安排,将环境目标纳入市场交易过程,其制度特征在合规性、可验证性及履约时效性等方面与绿色并购高度契合,因此政府采购更可能通过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并购这一外源式战略路径发挥绿色引导作用。

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以及增强外部监督,有效增强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动机。第一,政府采购有助于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绿色并购通常具有前期投入较高、中期资源整合不确定性较大及后期回报周期较长等特征,其战略推进高度依赖管理层的长期视野与可持续发展导向。然而,在现实中,绩效考核压力往往促使管理层更关注短期财务目标,忽视环境责任与长期价值创造,从而加剧代理冲突并阻碍企业绿色转型。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制度性治理工具,依托一系列明确且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短视行为并减少代理问题,进而增强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具体而言,政府在采购过程中兼具市场参与者与政策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其治理效应自采购合同签订起贯穿于采购活动的事中与事后全过程。在事中阶段,政府采购在招投标与合同签订过程中引入公开竞争、信息披露和契约约束机制。政府客户凭借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法律约束力与制度执行力,对企业经营状况、环境合规表现及履约能力进行系统审查^[1],从而动态掌握供应商运营状况与环境合规信息,显著提升了企业信息透明度^[7]。同时,合同对环境标准、履约责任及违约后果的明确约定,提高了管理层偏离长期目标的机会成本,从制度层面抑制了其机会主义行为。在事后阶段,政府通过验收、审计与问责等制度安排,对企业履约行为实施持续监督。一旦发现不合规行为,政府部门不仅会予以记录和惩戒,还可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对企业施加外部声誉压力,进一步压缩管理层谋取私利的空间。此外,长期稳定的供需合作关系有助于增强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缓解短期盈利压力^[11],进一步抑制管理层因绩效考核而产生短期行为的动机。总体而言,通过上述治理机制,政府采购将环境责任与合规要求持续嵌入企业经营决策之中,进而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

第二,政府采购有助于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意识,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并购。客户对绿色产品偏好的提升能够增强企业对绿色市场需求的感知,形成持续的合规压力,激发企业调整其绿色战略。作为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客户,政府在采购过程中通过不断强化产品生产的绿色标准导向,重塑企业的绿色认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提升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11]。同时,政府采购制度对产品绿色合规设定明确门槛,未达标的供应商可能面临合同终止等惩戒措施^[12],这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意识。在此背景下,相较于渐进式绿色创新,绿色并购更有助于企业在短期内补齐绿色技术与管理能力短板,降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企业在强化环境责任与提升绿色合规能力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战略选择^{[17][18]}。因此,政府采购通过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与绿色合规约束,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并购。

第三,政府采购能够通过吸引外部监督主体的关注来强化企业外部治理约束,倒逼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并购。获得政府采购订单不仅提升了企业合规声誉,还通过制度背书吸引了分析师和媒体等外部监督主体的关注,形成声誉约束机制^[19]。既有研究表明,分析师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增加资本市场监督压力,激励管理层更积极地响应环境问题,从而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并购^[4];而媒体则通过“聚光灯效应”放大环境违规曝光风险,增加企业所面临的公众舆论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压力,进而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并购以改善环保形象与合规表现^[16]。在多重外部监督压力下,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具有可观察性和即时效果的战略调整方式,而绿色并购因其结果更易被市场与监管主体识别,成为企业回应外部监督的重要路径选择。因此,政府采购有助于吸引外部监督主体对企业的关注,进而倒逼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并购。

另一方面,政府采购还能够发挥“资源效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有效提升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能力。充足的内外部资金是企业并购战略顺利执行的关键^[15],而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绿色并购行为^[17]。政府采购可以为企业提供更稳定的现金流并对外传递积极信号,进而缓解融资约束。其一,政府采购通过提供稳定订单来源,提升企业的运营稳定性,从而缓解盈利压力,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的积累^[11]。其二,政府客户因交易关系稳定以及违约风险较低等特征,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誉背书^[20]。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能够向市场传递企业在产品质量、技术能力及合规运营等方面的正面信号,提升市场对企业未来业绩增长的信心^[10]。这一信誉机制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1],提升银行信贷额度^[21]以及商业信用融资能力^[9]。因此,政府采购通过助力企业稳定现金流与提升融资能力,为企业推进绿色并购提供重要支撑。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说:政府采购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绿色并购。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绿色并购。首先,参考潘爱玲等和罗进辉等的研究^{[16][17]},本文仅保留股权收购且发生实质性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并将绿色并购定义为在企业并购决策过程中引入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行为。其次,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并购公告文本进行逐条解读,重点关注交易概述、标的公司基本信息以及主并方与标的公司的经营范围等内容。依据公告中是否出现“环境治理”“绿色”“减排”“污染治理”等关键词,判断其是否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并据此确定绿色并购事件。最后,本文构建衡量绿色并购的虚拟变量(*Greenma*),当主并企业在某年度内至少实施一项绿色并购交易时,*Greenma*取值为1,否则为0。

2.政府采购。借鉴韩旭和武威的做法^[22],本文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订单信息,通过供应商名称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全称进行匹配,在年度层面统计上市公司获取的政府采购订单情况。具体地,采用两种方法衡量政府采购:其一,政府采购虚拟变量(*PubProc*),当上市公司在某年度内至少获得一次政府采购订单时取值为1,否则为0;其二,参考武威等的研究^[2],构建政府采购规模变量(*PubProc_amt*),以上市公司年度政府采购订单总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其中,对于包含多个供应商的政府采购合同,按供应商数量对合同总金额进行均分,以确定单个供应商的合同金额^[22]。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5][17]},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绿色并购决策的企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Size*)、杠杆率(*Leverage*)、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wth*)、现金持有水平(*Cash*)、上市年限(*Age*)、产权性质(*State*)、两职兼任情况(*Dual*)、董事会规模(*Bsize*)、独董占比(*Indep*)、管理层持股情况(*Mshare*)、第一大股东持股情况(*Top1*)以及股权制衡度(*Herfd*)。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绿色并购	<i>Greenma</i>	企业某年度进行绿色并购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政府采购虚拟变量	<i>PubProc</i>	企业某年度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时取值为1,否则为0
政府采购规模	<i>PubProc_amt</i>	企业某年度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金额加1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杠杆率	<i>Leverage</i>	企业年末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	<i>ROA</i>	企业年末总资产收益率
成长能力	<i>Growth</i>	企业年末销售收入增长率
现金持有水平	<i>Cash</i>	企业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占总资产的比重
上市年限	<i>Age</i>	企业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i>State</i>	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两职兼任	<i>Dual</i>	董事长和总理由同一人担任时取值为1,否则为0
董事会规模	<i>Bsize</i>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董占比	<i>Indep</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管理层持股	<i>Mshare</i>	管理层持股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数(%)
股权制衡度	<i>Herfd</i>	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二)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 *Logit* 回归模型:

$$Greenma_{i,t+1} = \beta_0 + \beta_1 PubProc_{i,t} (PubProc_amt_{i,t}) + \lambda Controls + Year + Industry + Province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ϵ 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 *Greenma* 表示企业绿色并购,解释变量 *PubProc* 和 *PubProc_amt* 分别表示企业是否获取政府采购订单以及政府采购订单规模。考虑到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可能具有延迟性,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 *Year*、*Industry* 和 *Province* 分别代表年度、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自2015年3月起正式施行,且自同年起,中国政府采购网开始详细披露政府采购合同订单,故本文将初始研究样本限定为2015—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如下:政府采购数据来自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披露的订单协议信息,本文采用网络爬虫与人工校验相结合的方式数据进行清洗;上市公司并购事件、财务指标及公司治理相关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希施玛(CSMAR)数据库;媒体报道数据选自中国知网(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碳信息披露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地方环境治理相关信息主要依据地方政府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并辅以网络爬虫与人工方式进行补充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剔除ST、*ST样本、金融行业样本和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29776个公司一年度层面的观测值。为缓解极端值的干扰,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绿色并购变量(*Greenma*)的均值为0.246,说明样本中

约有 24.6% 的公司开展了绿色并购活动,这表明绿色并购已逐步成为我国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政府采购虚拟变量(*PubProc*)的均值为 0.194,说明样本企业中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比例为 19.4%;此外,政府采购规模变量(*PubProc_amt*)的均值为 3.138,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22.740,表明样本期内企业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规模差异较大。控制变量的各项统计量均呈现在合理的区间分布。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1/4 分位数	中位数	3/4 分位数	最大值
<i>Greenma</i>	29776	0.246	0.430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i>PubProc</i>	29776	0.194	0.395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i>PubProc_amt</i>	29776	3.138	6.558	0.000	0.000	0.000	0.000	22.740
<i>Size</i>	29776	22.257	1.326	19.843	21.310	22.058	23.007	26.386
<i>Leverage</i>	29776	0.410	0.205	0.054	0.245	0.399	0.558	0.910
<i>ROA</i>	29776	0.039	0.072	-0.262	0.013	0.040	0.075	0.230
<i>Growth</i>	29776	0.167	0.434	-0.606	-0.036	0.100	0.264	2.788
<i>Cash</i>	29776	0.188	0.132	0.016	0.094	0.152	0.247	0.650
<i>Age</i>	29776	2.021	1.002	0.000	1.386	2.197	2.890	3.401
<i>State</i>	29776	0.302	0.459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Dual</i>	29776	0.318	0.466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Bsize</i>	29776	2.217	0.176	1.792	2.079	2.303	2.303	2.708
<i>Indep</i>	29776	37.866	5.342	33.330	33.330	36.360	42.860	57.140
<i>Mshare</i>	29776	15.294	20.169	0.000	0.003	2.440	29.051	69.486
<i>Top1</i>	29776	33.300	14.740	8.220	21.880	30.950	42.935	73.700
<i>Herfd</i>	29776	0.804	0.624	0.037	0.317	0.646	1.142	2.846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政府采购变量(*PubProc* 和 *PubProc_amt*)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列(2)结果来看,政府采购订单规模每增加 1 个标准差,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概率显著提升 21.352%(=0.014×6.558/0.430)。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还是扩大政府采购订单规模,政府采购均有效激励了企业的绿色并购行为,由此本文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三) 稳健性检验^③

1. 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企业规模和经营能力等特征可能同时影响企业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概率与绿色并购倾向,从而导致样本存在自选择偏差。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调整。具体地,将样本期内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企业作为处理组(*Treat* = 1),未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企业作为控制组(*Treat* = 0),采用 1 : 1 无放回最近邻匹配法构建匹配样本。然后,本文引入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府采购的动态效应。参考黄继承和朱光顺的研究^[12],本文将企业首次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视为事件冲击,构造时点虚拟变量 *Post*,若观测年度为企业首次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当年及之后,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进一步构建交互项 *Treat* × *Post*,以期从动态视角识别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Treat* × *Post* 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控制组,处理组在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后的绿色并购行为显著增加,佐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 工具变量法。参考黄继承和朱光顺的做法^[12],本文选择如下两个工具变量:其一为上市公司 *i* 在 *t* 年所在城市 *c* 的街道办事处数量(*Street*),城市街道办事处数量反映了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程度,较多的行政单元通常对应更高的公共事务需求,从而与政府采购规模正相关;

表 3 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Greenma_{i,t+1}</i>	
	(1)	(2)
<i>PubProc_{i,t}</i>	0.240*** (0.043)	
<i>PubProc_amt_{i,t}</i>		0.014***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伪 R ²	0.098	0.098
样本量	24669	2466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异方差修正的稳健标准误;受篇幅限制,本文省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表同。

其二为同城市同年份除公司 i 以外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上市公司数量占该城市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 ($CityPeerGP$)。这一指标衡量了属地政府采购市场活跃度,其值越高,代表政府采购项目越多、竞争越充分,企业获得订单的概率越大。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 ($Street$ 和 $CityPeerGP$)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满足了工具变量相关性假设;同时,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 Cragg-Donald Wald F 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均显著大于 Stock-Yogo 10% 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 Hansen 检验结果亦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具备外生性。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政府采购变量 ($PubProc$ 和 $PubProc_amt$) 的回归系数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 其他稳健性检验。(1) 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为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人均 GDP、产业结构、财政分权度和城市化水平)以及行业×年度、省份×年度和行业×省份的高维固定效应,从而控制行业与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了遗漏变量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 剔除其他同期政策干扰。为缓解同期环境保护政策叠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控制了碳排放权交易、绿色信贷、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及环保法庭试点等政策影响。结果显示,研究结论在控制其他政策后依旧成立。(3) 替换关键变量衡量方式。本文以企业年度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数量替代政府采购强度指标,并以年度绿色并购金额和绿色并购事件频次替代绿色并购指标。结果显示,研究结论不受关键变量测度方式变更的影响。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上述经验证据表明,政府采购推动了企业绿色并购。本文进一步从“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两个维度,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

(一) 政府采购的“治理效应”

在假说推导部分,本文认为政府采购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强化外部监督,发挥“治理效应”,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并购。已有文献表明,管理层短视会抑制高风险绿色并购,企业环境责任缺失会降低企业绿色实践积极性,而分析师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可强化环境声誉约束,推动企业绿色并购^{[4][16]}。因此,本文从代理问题、环保认知及外部监督三个维度考察政府采购是否发挥“治理效应”。

首先,采用管理层短视度量代理问题。参考胡楠等构建的管理层短视词典^[23],本文识别并统计“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的短视相关词频占比,以构建管理层短视指标 ($Myopia$)。 $Myopia$ 的数值越高,表明管理层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目标,企业代理问题越严重。其次,采用碳信息披露程度衡量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借鉴孙晓华等构建的碳信息披露文本检索词典^[24],本文提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碳信息关键词,并统计其在全文中出现的词频占比,构建企业碳信息披露程度指数 (CID)。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在碳信息披露上越积极主动,环境责任意识也就越强。最后,从分析师覆盖和绿色新闻报道两个维度衡量企业外部监督强度。本文以当年企业的分析师跟踪数量构建分析师关注度指标 ($Analyst$),该变量的数值越高,表明企业面临的外部监督压力越大。借鉴 Gao 等的方法^[25],本文将每篇包含不少于 5 个绿色关键词的新闻报道界定为绿色新闻报道,在企业一年度层面上汇总其数量并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构建媒体绿色关注度指标 ($Media$),其数值越大说明外部绿色舆论监督越强。

参考于小悦等的研究^[9],本文用机制变量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以考察政府采购是否通过强化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发挥“治理效应”,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并购。表 4 列(1)(2)显示,政府采购变量 ($PubProc$ 和 $PubProc_am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抑制了管理层短视,缓解了代理问题;列(3)(4)的结果显示,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列(5)~(8)的结果显示,政府采购显著增加了中标企业的分析师关注度和绿色新闻媒体曝光度,强化了外部监督效果。综上,政府采购通过发挥“治理效应”促进了企业绿色并购。

表 4

作用机制分析:政府采购的“治理效应”

变量	<i>Myopia</i> _{<i>i,t+1</i>}		<i>CID</i> _{<i>i,t+1</i>}		<i>Analyst</i> _{<i>i,t+1</i>}		<i>Media</i> _{<i>i,t+1</i>}	
	(1)	(2)	(3)	(4)	(5)	(6)	(7)	(8)
<i>PubProc</i> _{<i>i,t</i>}	-0.440*** (0.086)		0.060*** (0.016)		0.075*** (0.016)		0.032*** (0.007)	
<i>PubProc_amt</i> _{<i>i,t</i>}		-0.028*** (0.005)		0.004*** (0.001)		0.004*** (0.001)		0.002*** (0.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120	0.120	0.280	0.280	0.474	0.474	0.191	0.191
样本量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注:为了便于查阅,本文对 *Myopia* 的数值进行了乘以 100 的量纲处理。

(二)政府采购的“资源效应”

在假说推导部分,本文认为政府采购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资源效应”,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并购积极性。此外,已有文献指出,资金约束会限制企业的绿色并购行为^[17]。为验证政府采购是否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影响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本文从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两个维度构建相关指标。

第一,本文将 SA 指数的绝对值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SA)的代理指标,其数值越大表明融资约束越严重。第二,从债务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成本两个维度衡量企业融资成本。具体而言,以净财务费用与总负债的比值衡量债务融资成本(*Dcost*)。其中,净财务费用包括企业的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以及其他财务费用。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及信用风险越高。权益融资成本采用 PEG 模型构建的 *R_peg* 指标衡量。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越高以及外部融资压力越大。

类似地,本文用机制变量替换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以检验政府采购在推动企业绿色并购过程中的“资源效应”。如表 5 所示,政府采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了融资压力。综上,政府采购通过发挥“资源效应”推动了企业绿色并购。

表 5

作用机制分析:政府采购的“资源效应”

变量	<i>SA</i> _{<i>i,t+1</i>}		<i>Dcost</i> _{<i>i,t+1</i>}		<i>R_peg</i> _{<i>i,t+1</i>}	
	(1)	(2)	(3)	(4)	(5)	(6)
<i>PubProc</i> _{<i>i,t</i>}	-0.008* (0.004)		-0.212*** (0.019)		-0.108* (0.063)	
<i>PubProc_amt</i> _{<i>i,t</i>}		-0.001*** (0.000)		-0.014*** (0.001)		-0.007*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332	0.333	0.356	0.356	0.183	0.183
样本量	24669	24669	24013	24013	22281	22281

注:由于债务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成本变量存在缺失值,所以相应观测值少于基准回归。

六、进一步分析

(一)区分政府采购类型

1.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按照采购主体的地缘匹配程度,政府采购可分为本地与异地采购。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与本地经济发展的考虑,往往优先将订单分配给本地企业^[26]。这种“本地偏好”在形成稳定的政企关系网络的同时,也削弱了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降低了本地企业在环境合规与

市场准入方面的压力^[27],并削弱了本地政府客户的监管效能^[28],最终减弱了政府采购对绿色并购的激励作用。相比之下,异地采购竞争性更强,更能有效地引导企业开展绿色并购。为验证上述推测,参考罗宏等的研究^[28],本文根据政府采购部门与中标企业是否位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域,将政府采购划分为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并构建相应代理变量(*Pub_local*和*Pub_offsite*),分别定义为企业在年度内获得的本地和异地采购订单金额加1后的自然对数。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8][28]},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置于模型(1)中进行回归分析,以比较二者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差异。

表6的列(1)显示,本地采购变量(*Pub_local*)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而异地采购变量(*Pub_offsit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两者系数差异显著,表明异地采购较本地采购更能有效推动企业绿色并购。上述结果表明,本地采购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其约束力较弱,而异地采购在更公平、透明的环境中强化了对企业的绿色履约激励。

2.绿色采购与普通采购。按照采购标的属性,政府采购可分为普通采购与绿色采购。绿色采购通过将节能减排和低碳标准纳入评审体系,将环保要求嵌入市场机制并强化企业环境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环境门槛、加大合规压力,能更有效地引导企业绿色转型^[13]。即相较于普通政府采购,预期绿色采购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并购。为验证这一逻辑,参考江鑫等的研究^[13],本文将政府环保采购与节能采购清单中由绿色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界定为绿色产品,相应订单视为绿色采购;同时,对采购订单进行文本识别,若包含“绿色”“环保”“低碳”等关键词,也将其归类为绿色采购,其余订单则视为普通采购。基于此,本文构建企业绿色采购金额(*Pub_green*)和普通采购金额(*Pub_nongreen*)代理变量,分别定义为企业在年度内获得的绿色采购和普通采购订单金额加1后取自然对数,并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置于模型(1)中进行回归分析。

表6 区分政府采购类型

变量	<i>Greenma_{i,t+1}</i>	
	(1)	(2)
<i>Pub_local_{i,t}</i>	-0.006 (0.005)	
<i>Pub_offsite_{i,t}</i>	0.018 *** (0.004)	
<i>Pub_green_{i,t}</i>		0.040 *** (0.009)
<i>Pub_nongreen_{i,t}</i>		0.012 ***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伪R ²	0.098	0.098
样本量	24669	24669
组内系数差异	0.024 ***	0.028 ***

表6的列(2)显示,绿色采购变量(*Pub_green*)和普通采购变量(*Pub_nongree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二者系数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采购通过明确强调绿色标准,强化了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了企业绿色并购。

(二)区分政府采购的供需关系特征

政府采购通过监督约束与资金支持双重机制推动企业绿色并购,其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供需关系特征的影响,尤其是供需互动时长与供需关系稳定性。

1.供需互动周期特征。较长周期的竞标与履约互动不仅有助于企业理解并落实政府的环境政策,还强化了政府对绿色生产全过程的监管,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并购意愿。由此可推断,供需互动周期越长,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效果越显著。为验证上述推测,参考武威等的研究^[2],本文将每笔订单从合同签订至正式公告的平均时间间隔在公司一年度层面汇总后加1取自然对数,得到供需互动周期代理变量(*Effi*)。较大的*Effi*值意味着政府在绿色资质审查、合规评估及技术标准沟通等环节投入了更多资源,从而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督。本文将*Eff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置于模型(1)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的列(1)所示,*Effi*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政府采购过程中,较长的供需互动周期会增强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效果。

2.供需关系稳定性特征。供需关系稳定性也会影响政府采购的激励效果,持续的政府采购订单会改善企业现金流与盈利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并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同时,稳定的采购关系有助于企业增加专用资产投入并促进供应链协同,使政府客户的绿色标准更有效地传导至供应商,进而

提升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并增强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29]。由此推断,供需关系越稳定,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效果越显著。为验证上述推断,参考武威等的做法^[2],本文以企业年度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次数加1后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供需关系稳定性(*Pers*),其数值越大表明政企之间的供需关系越稳定。类似地,本文将*Pers*作为解释变量纳入主模型回归。表7列(2)显示,*Pers*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与企业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不仅能够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而且可以强化长期合作下的绿色激励机制,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积极性。

(三)异质性分析

1.污染行业与非污染行业。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污染行业企业因高排放和高能耗等特征面临更严格的环境监管和合规要求,这增加了其环境诉讼和环保合规风险。此外,在绿色信贷政策指引下,金融机构通常会对具有污染属性的企业采取更为审慎的授信态度,这加剧了其融资约束。因此,受制于环保合规要求和资金压力,污染行业企业往往更缺乏绿色转型动力,由此倾向于规避成本高、风险大以及回报周期长的绿色并购项目^{[15][17]}。在此情境下,政府采购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效应”,不仅为污染行业企业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支持,还通过信用背书向市场传递正面信号,提升企业环保合规形象和融资能力^[11]。由此推断,相较于非污染行业企业,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参考陈海强等的做法^[5],本文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界定为污染行业,设置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是否属于污染行业(*Polluter*),并构建其与政府采购变量的交互项。表8的列(1)(2)显示,交互项(*PubProc* × *Polluter* 和 *PubProc_amt* × *Pollute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非污染行业企业。

2.行业竞争程度。在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中,企业往往面临更大的业绩压力与运营不确定性。因此,管理层为维持其职业声誉,倾向于优先追求短期财务绩效,规避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项目,从而抑制绿色并购。在行业竞争激烈时,政府采购一方面通过稳定的订单提升企业现金流预期,缓解短期绩效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绿色导向与政策信号,增强外部监督与声誉约束,更能有效激发管理层推进绿色并购的动力。由此推断,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激励效果更显著。本文采用基于资产规模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企业所处行业的竞争程度。该指数越小,代表行业竞争程度越高。本文依据该指标的年度一行业一省份中位数界定高行业竞争虚拟变量(*HHI_low*),当企业所处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低于年度一行业一省份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政府采购与行业竞争程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表8的列(3)(4)显示,交互项(*PubProc* × *HHI_low* 和 *PubProc_amt* × *HHI_low*)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高度竞争行业中,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3.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环境政策执行强度的地区差异会影响企业对绿色政策的感知与响应。一方面,在环境治理强度高的地区,企业面临较高的环境合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提高环境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地提高绿色生产能力和获取低碳技术,以期增强环境合规能力、改善环境绩效并降低合规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也加强了政府客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积极性,从而放大了政府采购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激励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反之,在环境治理强度较弱的地区,政府采购对绿色标准要求的执行力度会减弱,由此降低企业中标的绿色门槛,削弱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激励作用。由此推断,在环境治理强度高的地区,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的方法^[30],以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相关词汇的频数占比来衡量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该指标越大表明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重视程度越高。本文

表7 区分政府采购的供需关系特征

变量	<i>Greenma_{i,t+1}</i>	
	(1)	(2)
<i>Effi_{i,t}</i>	0.053*** (0.013)	
<i>Pers_{i,t}</i>		0.071***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伪R ²	0.098	0.098
样本量	24669	24669

按照该指标的年度—行业—省份中位数界定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虚拟变量(*Frequ_high*),当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大于年度—行业—省份中位数时取值为1,否则为0,并构建其与政府采购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表8的列(5)(6)显示,交互项($PubProc \times Frequ_high$ 和 $PubProc_amt \times Frequ_high$)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环境治理强度较高的地区,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污染行业企业		行业竞争程度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	
	<i>Greenma_{i,t+1}</i>					
	(1)	(2)	(3)	(4)	(5)	(6)
<i>PubProc_{i,t}</i>	0.102 (0.064)		0.158*** (0.058)		0.188*** (0.047)	
<i>PubProc_amt_{i,t}</i>		0.004 (0.004)		0.009** (0.004)		0.011*** (0.003)
<i>PubProc_{i,t} × Polluter_{i,t}</i>	0.237*** (0.083)					
<i>PubProc_amt_{i,t} × Polluter_{i,t}</i>		0.018*** (0.005)				
<i>Polluter_{i,t}</i>	-0.134 (0.105)	-0.144 (0.104)				
<i>PubProc_{i,t} × HHI_low_{i,t}</i>			0.165** (0.078)			
<i>PubProc_amt_{i,t} × HHI_low_{i,t}</i>				0.009* (0.005)		
<i>HHI_low_{i,t}</i>			-0.006 (0.038)	-0.003 (0.038)		
<i>PubProc_{i,t} × Frequ_high_{i,t}</i>					0.298*** (0.105)	
<i>PubProc_amt_{i,t} × Frequ_high_{i,t}</i>						0.018*** (0.007)
<i>Frequ_high_{i,t}</i>					-0.140*** (0.043)	-0.138*** (0.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伪R ²	0.099	0.099	0.098	0.098	0.098	0.099
样本量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24669

(四)经济后果检验

上述经验证据表明,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并购积极性,且其作用效果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差异化特征。然而,绿色并购是否真正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仍有待检验。潘爱玲等指出^[16],重污染企业虽然在外媒体压力下表现出较强的绿色并购动机,但这一行为并未实现实质性的绿色转型,即存在“名义转型”现象。类似地,尽管政府采购可以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激发企业的绿色并购意愿,但此类并购究竟是为了满足政策合规门槛而做的“表面文章”,还是实质性绿色战略选择?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后的环境绩效、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市场价值三个维度出发,评估政府采购是否通过推动绿色并购,助力企业成功实现绿色转型。

首先,参考苏丹妮和盛斌的做法^[31],本文以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自然对数的相反数衡量企业环境绩效(*EI*),该变量的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环境绩效水平越高。其次,以企业当年独立申请并最终获得授权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Green_innovation*)。最后,参考已有研究^{[5][17]},选取企业绿色并购实施后一年与前一年托宾Q值的差值($\Delta TobinQ$)衡量企业的市场价值变动情况。本文将上述经济后果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政府采购与绿色并购的交互项对其进行

回归。

表 9 的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与绿色并购的交互项($PubProc \times Greenma$ 和 $PubProc_amt \times Greenma$)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政府采购政策的引导下,企业实施绿色并购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绩效、推动绿色创新并增加市场价值,从而实现绿色转型和价值提升。

表 9 经济后果分析

变量	环境绩效		绿色创新绩效		市场绩效	
	$EI_{i,t+1}$		$Green_innovation_{i,t+1}$		$\Delta TobinQ_{i,t+1}$	
	(1)	(2)	(3)	(4)	(5)	(6)
$PubProc_{i,t} \times Greenma_{i,t}$	0.256 ** (0.118)		0.070 ** (0.033)		0.052 ** (0.026)	
$PubProc_amt_{i,t} \times Greenma_{i,t}$		0.014 * (0.007)		0.004 * (0.002)		0.003 ** (0.001)
$PubProc_{i,t}$	0.006 (0.058)		0.053 *** (0.013)		-0.019 (0.014)	
$PubProc_amt_{i,t}$		0.001 (0.004)		0.003 *** (0.001)		-0.002 * (0.001)
$Greenma_{i,t}$	0.016	0.016	0.054 ***	0.054 ***	-0.046 ***	-0.045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 ²	0.260	0.260	0.168	0.168	0.148	0.204
样本量	23706	23706	24283	24283	23793	23786

注:为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各经济后果的代理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

七、结论与启示

在“双碳”战略目标引领下,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我国实现低碳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环境激励政策,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经济后果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基于此,本文以 2015—2023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推动了企业绿色并购,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一作用在异地采购和绿色采购情境下更为突出;较长的供需双方互动周期以及较稳定的供需关系,更能放大政府采购的绿色激励效果。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采购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以及加强外部监督发挥“治理效应”;并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发挥“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的动机与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属于污染行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区政府环境治理强度较大时,政府采购对绿色并购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后,其环境绩效、绿色创新水平以及市场价值均显著提升,表明政府采购不仅激励了企业开展绿色并购,而且有助于推动其完成实质性绿色转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绿色采购体系,强化全过程监管与激励机制。研究表明,政府采购的绿色偏好能够有效激励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实现绿色转型。因此,应持续提升政府采购清单中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比重,优化绿色采购标准和认定体系,增强政策导向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在政府采购评价体系中,应将企业环境绩效以及绿色创新能力等实质性绿色指标纳入评审范畴,引导企业将绿色能力建设作为长期战略目标。同时,可通过配套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强化政府采购的“资源效应”,为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和后续整合提供必要经济保障。在监管层面,建立覆盖合同执行和项目履约的动态监督机制,提升采购过程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并引入第三方环境审计等独立监督机制,对绿色转型成效进行客观评估。对绿色绩效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优先采购资格或差异化激励,对仅进行“名义绿色转型”的企业,则应通过问责、取消采购资格等机制加以约束,确保政府采购发挥实质性“治理效应”。

第二,推动跨区域采购一体化,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激发市场活力。本文发现,异地采购对企业绿

色并购的激励作用更明显,而本地采购易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和政企合谋,从而削弱政策效果。为此,应加快建设统一、开放和透明的全国政府采购平台,推动跨区域采购规则的协调与落地,减少地区分割带来的制度摩擦。同时,可将跨区域采购执行情况及其绿色绩效表现纳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弱化单一经济增长导向下的地方行政干预动机。此外,对同城采购中可能存在的非市场化交易行为,应强化独立第三方监管和定期环境绩效评估,并通过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提高政府采购政策的约束力与公信力,确保其绿色引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注释:

①数据来源: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官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公告(<https://sthjt.ah.gov.cn/public/21691/110885891.html>);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先河环保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14612&stockCode=300137&announcementId=1204574807&announcementTime=2018-04-02%2016:22>)。

②数据来源:https://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511/t20251112_3976264.htm。

③受篇幅限制,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留存备案。

参考文献:

[1] Cohen, D., Li, B., Li, N. et al. Major Government Customers and Loan Contract Term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2, 27: 275—312.

[2] 武威,曹畅,王馨竹. 政府采购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7): 113—133.

[3] Even-Tov, O., She, G., Wang, L. L., et al. How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hapes Corporate Climate Disclosures, Commitments, and Actions[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25, 30: 1968—2014.

[4] Yi, Z., Liu, H., Wang, Y., et al. How does Green Finance Policy Affect Firms' Pro-environmen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Accounting & Finance*, 2024, 64(5): 4723—4748.

[5] 陈海强,胡晓雪,李东旭. 金融考核“绿色化”与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基于信号效应的视角[J]. *金融研究*, 2024(2): 131—148.

[6] Hu, J., Fang, Q., Wu, H. Environmental Tax and Highly Polluting Firms' Green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Energy Economics*, 2023, 127: 107046.

[7] Samuels, D.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Changes in Firm Transparency Available to Purchas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1, 96(1): 401—430.

[8] 刘启亮,田志凡,陈冬,等. 政府采购与公司避税:政治压力还是监督治理[J]. *会计研究*, 2024(6): 70—86.

[9] 于小悦,高思凡,于苏,等. 政府采购与企业稳就业[J]. *财经研究*, 2024, DOI: 10.16538/j.cnki.jfe.20240318.101.

[10] Cohen, D. A., Li, B. Customer-base Concentration, Investment, and Profitability: The U.S. Government as a Major Customer Available to Purchas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0, 95(1): 101—131.

[11] Yu, X., Li, Q., Zhang, L. Major Government Customer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4, 183: 114853.

[12] 黄继承,朱光顺. 绿色发展的中国模式:政府采购与企业绿色创新[J]. *世界经济*, 2023(11): 54—78.

[13] 江鑫,胡文涛,许文立,等. 政府绿色采购如何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11): 200—220.

[14] Wang, Y., Wang, S., Wang, X.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Corporate Low-carbon Transition: A Driving Mechanism Based on Dual External Pressur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5, 98: 103865.

[15] 吴烨伟,郝若鸿,韩宇航.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环境治理效应:绿色并购的视角[J]. *管理科学*, 2023(5): 18—31.

[16] 潘爱玲,刘昕,邱金龙,等. 媒体压力下的绿色并购能否促使重污染企业实现实质性转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2): 174—192.

[17] 罗进辉,巫奕龙,刘海潮,等.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并购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23(11): 34—49.

[18] 潘爱玲,张启浩,李广鹏. 中小投资者环境关注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吗[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7): 135—147.

[19] Hadley, B.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Political Sensitivity: Evidence from Government Contractor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9, 59: 276—301.

[20] Asaad Al-Thaqeb, S. The Effect of Major Customer Type on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J]. *Asia-Pacific*

[21] Goldman, J. Government as Customer of Last Resort: The Stab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on Firm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0, 33(2): 610—643.

[22] 韩旭, 武威. 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吗——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 会计研究, 2021(6): 129—143.

[23] 胡楠, 薛付婧, 王昊楠. 管理者短视主义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 ——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J]. 管理世界, 2021(5): 139—156.

[24] 孙晓华, 车天琪, 马雪娇.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迎合行为: 识别、溢价损失与作用机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 132—150.

[25] Gao, J., Wu, H., You, J., et al. Green Media Coverage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25, 52(1): 48—90.

[26] Tang, W., Wang, Y., Wu, J. Local Favoritism in China's Public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Frictions or Incentive Distor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5, 145: 103716.

[27] 黄玖立, 李坤望.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 经济研究, 2013(6): 71—84.

[28] 罗宏, 彭馨怡, 白雨凡. 政府扶持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 ——基于政府采购的经验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1): 58—70.

[29] Chu, Y. Q., Tian, X., Wang, W. Y. Corporate Innovation along the Supply Chain[J].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65(65): 2445—2466.

[30] 陈诗一, 陈登科. 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 2018(2): 20—34.

[31] 苏丹妮, 盛斌. 服务业外资开放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的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6): 61—79.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Corporate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EN Wen WANG Sa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green and low-carb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by accelerating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a key pathway towar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Using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firms o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5 to 2023,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guiding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firms' engagement in green M&As,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he abo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under cross-regional procurement and green procurement arrangements. Moreover, longer procurement interaction cycles and more stable buyer-supply relationships strengthen the green governanc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enerates a "governance effect" by improving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external monitoring, thereby enhancing firms' incentives to pursue green M&As, as well as a "resource effect"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which improves firms' capacity to undertake such transaction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urther suggest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s stronger for firms in polluting industries, in mor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in regions with strict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dditional analyses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show that green M&As induced by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ignificantly improve firm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green innovation, and market valu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green M&As 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form policy aimed at fostering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reen M&A; Governance Effect; Resource Effect; Green Transformation